

司、加大宣传、减轻税负等方法,“集新法之长,补旧法之短”。而其中最直接防止茶叶掺假作伪的方法就是实施茶叶出口质量检验。上海口岸开埠之后,洋行逐渐兴起,1859年达62家,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保险、金融等业务,偶尔兼营出口商品检验,当然这些都属于商业行为,而非政府监管。1914年中国近代实业家、农商部长张謇提出:“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遴派富于茶叶学术经验之员,督同中西技师,前往办理。凡出口茶之色泽、形状、香气、质味,均须由检查所查验。其纯净者,分别等级,盖用合格印证;其有前项伪情弊者,盖用不合格印证,禁止其买卖。”次年设立永嘉茶叶检验处,查温州茶叶、禁假茶出口。1928年民国《工商行政纲要》提出:“于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举各种重要商品加以检验,一方面限制窳劣商品不得输出,使我国商人于世界增进其贡献;一方证明我国输出商品其优良已合于文明各国需要,而不得再事藉口禁止输入。”次年3月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对棉花、生丝、豆类、桐油、牲畜正副产品等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实施检验,颇具效果,中国植物病理学教育先驱邹秉文任局长,1932年蔡元培三子、畜牧兽医学专家蔡无忌接任局长。1930年中国著名农学家、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任职上海商品检验局,制定一整套出口茶叶检验标准、细则与实施办法,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机构设立对出口华茶质量起到明显的监督作用,有效地防范了茶叶掺假作伪的现象。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国力衰弱,商品质量水平总体落后,掺假作伪现象层出不穷。茶叶作为中国大宗出口商品,因掺假作伪严重自然倍受关注。事实上,除茶叶外其他商品掺假作伪问题同样严重,如一些奸商在棉花中掺水增重,以至于英商船上的棉花过了赤道之后全部腐朽发霉。宁波及其附近的草帽、草席出口一度兴旺,但因质量低劣、工艺粗糙,致使出口几乎完全停滞。而此时政府根本无力顾及质量安全,无法建立国内监管制度。对外贸易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首当其冲地受到英美法等国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压力,于是率先与世界接轨,开始实施出口商品检验,

探索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市场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要迟很多。

中国近代卫生防疫的起步

对外贸易促进货物全球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问题,严把进口关才能维护本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近代中国口岸质量安全监管重心则放在出口环节,以此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仅对少数进口商品实施检验。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化学肥料开始输入中国,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推销和使用。由于不法商人用劣货假冒化肥在市场混售,欺骗农民以致严重影响农业生产。1929年7月起,上海农产物检查所对进口肥料执行检验管理。1930年3月,该所又奉令增设蚕种检查所,办理进口蚕种和国内自制蚕种的检验,防止蚕病传播,以保护蚕丝生产,由此揭开了上海实施进口商品检验的开端。

货物商贾往来产生最大的安全隐患是传染病,其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命健康。开始于公元541年的一场鼠疫肆虐了半个世纪,1/4的东罗马帝国人口失去生命,17、18世纪的天花造成欧洲1.5亿人死亡,一战后的西班牙流感夺去起码2000万人的性命。随着世界贸易发展,传染病跨地区风险越来越大。1340年开始,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的鼠疫散布到欧洲,造成全世界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2500万为欧洲人。1348年,意大利在威尼斯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卫生检疫站,以防止鼠疫等传染病传入国内,首创口岸卫生检疫。从1817年,霍乱从印度恒河三角洲蔓延到欧洲,又到达北美并波及整个北半球,仅印度死亡就超过3800万人。

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传染病的威胁随之而来,1846年上海口岸就有霍乱传入记录,1862年驻扎城郊的外国兵营发生霍乱,并迅速蔓延,次年7月三个周内上海每日因霍乱病死从700人增至1200人。19世纪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均波及上海,又由上海沿交通路线一路扩散,直至北平、直隶、山东、东三省等地。1863起,清政府邀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全权帮办海关事务。1873年初,南洋诸国再度流行霍乱,上海港受到威胁。当年7月,由洋人帮办的上海江海关采用西医公共卫生学理论,引入世界通行卫生检疫做法,制订四条检疫

规章。8月15日,上海江海关医官亚历克山·詹梅逊对来沪船舶开检,西方轮船检疫制度就此传入,开中国卫生检疫之先河。随后,中国各对外港口相继效仿实施海港检疫。翌年,上海江海关制订《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规定:“倘船上有许多传染病例,卫生官员可令船舶航行到吴淞口红色浮标之外。”其后,上海海港检疫规章制度逐步完善,1894年在杨树浦建立检疫机构,1905年和1911年分别在张华浜和三汉港设立防疫医院,1912年在吴淞建立里检疫处,监测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黄热病等传染病,并对出入境人员接种预防天花、霍乱等疫苗。这些措施不仅有效防范外来传染病传播到中国,而且引导建立近现代中国公共卫生防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洋人帮办卫生检疫固然有保护租界、维护贸易的利己目的,但客观上使中国卫生检疫一开始就引入世界先进做法。

中国近代卫生防疫和一个人密切相关,他是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被誉为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1907年,伍连德受袁世凯邀请,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1910年10月,东北发生鼠疫,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横扫东北平原,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朝廷急电召伍连德受任北

满防疫处总医官。伍连德采取现代隔离、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火化鼠疫患者等多种防治尸体手段,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夺走6万余人性命的灾难。如果没有伍连德,这场疫病夺走的中国百姓生命将不是六万,可能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1916年伍连德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次年又扑灭山西一场夺去16000人生命的鼠疫,1920—1921年又成功控制了东北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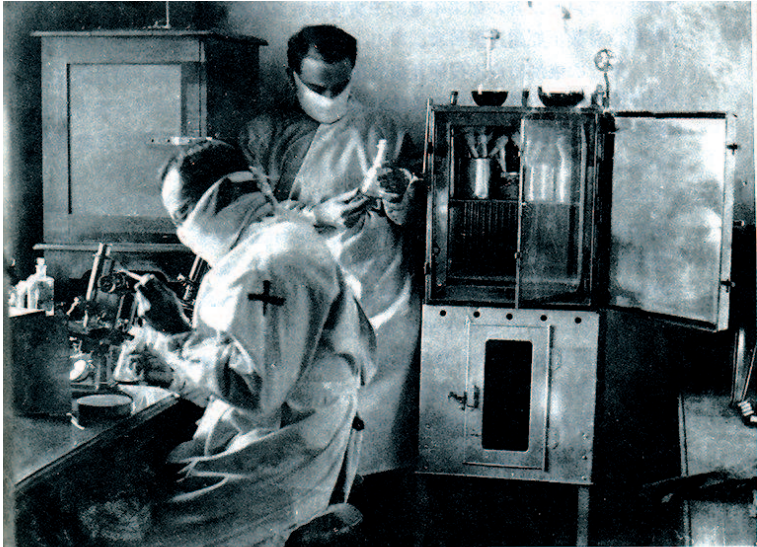
1930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伍连德任处长兼任所长,接管了外国人帮办近70年的中国海港检疫机构,实现中国人自主检疫。当时海港检疫工作充分体现了国际性和现代性,多次派医官赴欧美各国考察学习先进海港检疫方法,中国和国联卫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建立了疫情通报制度,签署认可了1926年通过的《国际卫生公约》,并以此为基础制订了《海港检疫章程》,采用了当时国际检疫新法防疫。其后,又制定一系列组织规范、工作规范等规章制度,构建相对完备的法规体系。1925年后上海几乎年年流行霍乱,为此,1930年国民政府在海港检疫管理处设立上海(中央)霍乱防疫事务所,对外向国际卫生组织通报疫情,对内协调各方开展霍乱防治,海港检疫实现内外联通,职能远远超过了口岸防

疫。在成功防御了1930和1931年霍乱后,1932年中国出现了近百年最为强烈的霍乱流行,再加上“一·二八事变”,上海4296人染病,但由于霍乱防疫事务所采取注射菌苗、清洁水源等措施,死亡率仅7.4%,为全国最低。

30年代上半叶伍连德治下的中国海港检疫超越那个时代,1932年后霍乱平静了四年,鼠疫销声匿迹,斑疹伤寒无流行之虞。日本因担心上海霍乱传入,曾派高级医官腾侯来沪考察,当他离开时说:“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海港检疫工作深为赞美,以后对上海防疫事宜不足顾虑。”1933年国联卫生组织组长拉希曼博士认为:“中国方面之检疫工作,锐意改进,在过去三年中成绩斐然可观。”同年东南亚同行专门来沪参观学习。然而抗日战争打断了中国卫生检疫高歌猛进的步伐,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上海沦陷。1938年1月7日,海港检疫管理处被迫停止工作,伍连德举家重返马来避难,开设一家私人诊所为生。这年六月起上海再度爆发霍乱,成为近二十年上海最严重的一次流行病,7289人死于疫病。1960年1月21日,81岁的伍连德在马来西亚檳榔屿悄然离世,没人想起这位老人曾为中国卫生检疫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



1921 年哈尔滨鼠疫防疫人员



1921 年,伍连德和伯力士在哈尔滨实验室